

主编 / 万 燕

# 享受人生

李银河 / 著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  
做那些能够引起我兴趣的研究  
我愿意把生命用在这些  
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当代女学人文丛

我希望自己如此度过一生  
读有趣的书  
写有趣的书  
听美的音乐  
看美的画  
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  
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dangdainüxuerenwencong

享  
受  
人  
生

李银河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d a n g d a i n ú x u e r e n w e n c o n g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  
做那些能够引起我兴趣的研究  
我愿意把生命用在这些  
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面  
我希望自己如此度过一生  
读有趣的书  
写有趣的书  
听美的音乐  
看美的画  
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  
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享受人生 / 李银河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当代女学人文丛)

ISBN 7-80647-219-3

I . 享… II . 李… III .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752 号

**书 名:**享受人生

**主 编:**李银河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375

**字 数:**14 万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11.20 元

ISBN 7-80647-219-3/I·161

---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近照

# 总序

万 燕

事情还得从 1998 年 9 月 20 日在河北承德召开的第四届女性文学研讨会说起。那天晚上，会议安排与会代表座谈“女性文学与出版”的话题，我刚从门外走进会场，就被主持人提溜到话筒跟前“贡献”点子。脑子还没回过神来，只得硬着头皮上阵，贡献了诸如“女学人随笔丛书”、“女学人评论丛书”之类的歪点子，心想：谁爱折腾谁折腾去吧。

就此搁下不提。

转眼到了 1999 年初，广州方面有人策划出版“女博士随笔丛书”，向我约稿。后来七搞八搞有点“丛”不起来，要交给书商去操办了。我想，与其这样不尴不尬，不如把自己去年那个歪点子做起来，或许更有价值。恰逢 7、8 月间身体不适，无法写作，就和出版社张罗起这件事来。

当“点子”付诸实践时，一系列的问题也跟着出来了。

例如“女学人”这个概念的确定。人们会凭思维惯性质问：某某某能算女学人吗？那么，什么样的人算“女学人”？书斋出身有学位者？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自我潜心于某一研究领域却无职称者？不以任何学术为业的学养浸润者？答案非常不确定。

再例如是否只收文学领域女学人的随笔？其他领域的收

不收？如果收了，她们是否能较好地以散文随笔的形式传递双重可能性——即在保有自身领域特点的同时创造散文随笔的独特风采？如果不收，这能算作规模比较整齐的女学人随笔丛书吗？丛书的姿态又应该如何？前卫的？不时尚的？怀旧的？在汗牛充栋的随笔集、散文集里，在众音浮喧的女性丛书里，再增加这么薄薄的十本书究竟有多大的必要？

而且，我们和大家一样，渴望也害怕走进大大小小的书店，那里面好书成林，坏书成堆，我们的丛书会尘埃落定在哪里？

问题确实很多，但是有两点定位最初就很清楚：避开小女人气，避开纯学术性。

站在这两点定位上思考上述一系列问题，图景就变得渐渐明晰起来：为了保有丛书的特征和实质，我们不再执着于“女学人”的内涵和外延，这个词不再受“术业有专攻”的圈限，而是定位于当代知识女性的内在面目，同时注重作者本人的思考、学养和对文化的关注，注重老、中、青三个年龄层面的视野，注重理性和感性的双重文化意义，注重多个领域的重要作者和内容。情怀或浓或淡，状态或中心或边缘。

仅以领域的确定而言，我们采取了作者和内容双向互补的方式，形成社会、翻译、文化、历史、艺术、文学六大板块。例如李银河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她本人的学术定位决定了她的大部分随笔要以社会学的形态出现。当她用沉着朴素的笔调谈论“我的女性观”、“我对‘一夜情’的看法”时，实际上已经走出了高深的社会学研究，走进了社会关怀的领地。同样，从事东欧文学译介的崔卫平亦是同一性质，她敏于思辨的特长，借助对中国以外作品和人物的理解，反弹到中国文化本质之

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多元的思考状态。而张文华的“术业”身份没有这么固定,她一直淡入淡出于社会,却长期浸染于文化,对音乐、绘画、自然、精神、文学、人情、学术、人生往事今情的独特品味,奠定了她隽永醇厚的底蕴。艾云也非学历史出身,但她的这本书可说是“当代女学人文丛”中规模最齐整的一本“课题性随笔”。她以西方和俄罗斯历史上的六个杰出女人为题,杂糅了史实、随笔乃至小说的笔法,在事实中想象,在想象中思索,在思索中升华,显得既大气又绚烂。马莉的定位则非常别致,她写诗,办过画展,但是这些表面的艺术形式,远远比不上她的文本的内在艺术状态,她用变幻迷离的语言,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艺术氛围,即使在大量的书话中也弥漫不已。

此外,作为体现文学性质的散文随笔,文学领域的作者自然还是占了较大比重。德高望重的乐黛云先生,以她凝重深邃的眼光纵横古今中外,笔墨所到之处,无不抉幽发微、沉潜蕴藉。当代著名评论家李子云,以数十年不变的诚实优雅,从容辗转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飘扬出令人回味的音色。作家、学人双栖的徐坤,把机智鲜活的面目从小说的“虚”外化为散文的“实”,独特的智慧与调侃渗透在热气腾腾的笔墨之中。至于女性文学专家林丹娅的幽默典雅,则将智性的思考和知性的怡情集于一身,不卑不亢,不张不扬,境界十分深远。

显而易见,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希望由此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纷繁多姿的,同时能够全部归附到知识女性的主体上来。因此,她们个人的情感、经历、眼光也以不同面目定格在丛书之中。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哲学等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而缺失了。

纵观 20 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化，女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低估。而这些女人当中，有一批自学养出发、自专业领域出发而渗透随笔散文的女人，尤其坚持了自己超然的追求和声音。而这一切，都是她们以女人的身体拥有、感受着的。正如龙应台所言，当她面对社会历史、面对先人古书时，她还必须面对“我是个女人”的体验，这种体验直接反证了当代知识女性的“学养——情怀”之宝贵，这种宝贵可以说是“当代女学人文丛”作为一套随笔丛书在文化史上最具价值之处。

正是这种宝贵促发了“当代女学人文丛”的诞生和面世，促发了作者们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促发了各种有关插图和封面的奇思异想（插图分色块和线条两种形式，基本上每二至三篇文章配一幅）。这个过程可以用几句老话来形容：“初生牛犊不怕虎”，“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个中情形即约略可见了。

但是，从过程到结果，毕竟是一种流动不羁的形态，其中潜伏着许多变数，丛书的疏漏之处未免影响了策划初衷的逼真再现，这当然是由于我们视野和精力的不足造成的，还望读者海涵。

这套书付梓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很长——跨越了两个千年。这种交织着现代迅疾与古老漫长的时间隐喻性，无疑借学养中的女人的书写，暗示了全部女人命运的缩影。从这个缩影走进去，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写作中，在阅读中，在生活中，女人与人类历史一致而又不一致的变迁。

2000.2.8 于深圳大学海青楼 201 室

# 自序

我还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书，它与我所写作出版过的所有的书全都不同——那些书都很沉重，而这本书相比之下要轻松得多。我把书名定为“享受人生”，这表明了我的生活哲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创造艺术品变成了某些专家的一门专业，而最应当成为艺术品的应当是人的生活本身。

李银河

# 目 录

1	总 序	万燕
1	自 序	李银河
·自我与情感·		
3	我的心路历程	
21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	
27	我们曾经拥有	
31	《绿毛水怪》和我们的爱情	
35	我的人生第一课	
38	疯狂年代	
·社会与人生·		
43	我的女性观	
46	男女平等将走向何方	
50	男女关系一百年	
54	性别角色定式是对男女两性的压迫	
57	家庭暴力与女权主义	
64	世纪末的家庭与妇女	

67	单身女人现象之我见
70	情与性关系中的性别差异
73	我对“一夜情”的看法
76	性有多么重要
81	千年回顾——性规范的变迁
87	性用品在中国
89	反对安全套的要害是反性
92	“不用则废”——西方老年人的性观念
96	在修改婚姻法时要警惕倒退
104	法律与婚外性关系
109	我看离婚
113	我看同性恋的法律地位
128	关于酷儿理论
144	西方后现代女权主义
160	关于卖淫问题的理论思考
180	对 21 世纪的预测
183	《中国女性的性与爱》韩文版序
186	从《雍正王朝》说开去
188	对《百年因缘》的评论
190	影视作品的性意识

# 自我与情感



# 我的心路历程

俗 话说三十不学艺，我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美国求学时刚好三十岁。回想当时常令我感到烦恼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一生都在准备，准备做什么事，可一直还没正经做。我还要准备到何时？大概是受了这种想法的刺激，1988年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径直回国了。

在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创造）。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准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一直在修炼。我的一生一直到1988年，也就是我三十六岁时，一直在准备。就像一头牛，一直在吃草。现在到了产出牛奶的时候了。三十六岁，真是够晚的了。当然，这里面有许多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比如从十七岁到二十二

岁，我一直在做体力劳动。虽然我也在一天天令人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之后，尽我所能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文学”书，但是我的生命曾耗费在成年累月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上。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凭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

我常常这样想，最幸运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在八小时之内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他爱做的事情。可以说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幸运儿。

回国之后，我被接纳为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北京大学社会学所）的第一个博士后。我以一种狂热的劲头投入了研究工作：毕竟我准备了太久太久。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烈地迸发出来，我一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其实，其中的一个就已经够我“交差”的了，但是我的研究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交差”。这种疯狂劲我现在回头看都有点暗自吃惊。难怪一个台湾社会学访问团和我们座谈，当我谈到这两年我完成的题目时，对方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十项研究的结果是十篇论文，每篇一万五千字上下。这十个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我在两年间搞十项研究疯得还不够厉害：回国之前，我做了个“社会学百题”的备忘录，现在有时还会翻看，觉得自己比当时的气魄已经小了许多。

这十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有的题目有新闻价值——如自愿不育和同性恋——常常被通俗刊物和报纸、电台、电视台报道。那天在地铁买了一份小报，

上边有个署名“黑娃”的人在头版头条写了一篇关于自愿不育的文章，我一看，里面怎么尽是我论文里的原话，心里不免有些愤愤然；可转念一想，人家虽然没指明哪段是出自我的手笔，但该羞愧的是他而不是我——只是不知这位黑娃是否是真的非洲种，也许是他自觉够黑的，起了这样一个笔名。人如果有东西值得别人一偷，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尽管上小报有点“丢份”，也不至于就为这点事跟人“叫真”。这么想过之后，心里也就释然。后来，这十篇研究论文被编辑为一本论文集，取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出版，虽然只印了四千册，我也挺满足的——我还见过只印三百册的学术书呢。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并且在 1998 年再版。

我心里清楚，从外面拿文科博士学位回来的人还不多见，因此如一些爱为人指点迷津的朋友所说，回来的人有一种“势能”。问题在于用这种“势能”来做什么。我之选中经验研究一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体说来，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看不起经验科学的偏向，因此社会科学远不如人文学科那么发达。人们都偏爱一些气势恢宏的高谈阔论，近年来“侃”字的出现频率之高就是证据。而我的抱负是要做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这些话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想分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但是众所周知，这不容易，真话也挺没劲的。为了和信口开河者划清界线，我甚至不惜把自己搞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在我用通过经验调查得来的数据写论文和专著时，有时竟感到可说的和能说的话是那么少，以致担心自己的想像力已经衰退了。与此同时，我看到那些高谈阔论的研究，就为别人捏把冷汗。人家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

已经够研究一辈子的啦。

我潜心经验研究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还不规范。有的研究不信不实，在方法的运用、研究的设计方面尚有不少欠缺。我毕竟是实实在在地学了六年社会学，看到这种现象就感到了一种挑战。这就像看到有人一手持一根筷子吃饭，谁都想给他露一手用筷子的绝技一样。

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又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我们是指我和我丈夫。这个题目颇遭同行和有关部门诟病。从搞调查到出书，遇上了不少头疼的事。好在研究成果终于写成专著，在香港由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假如我们能沉住气的话，还可能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直到现在，我还不理解那些诟病出于什么动机。同性恋者不是人类吗？同性恋不是社会现象吗？社会学到底该做些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还想做女同性恋的研究，只是苦于找不到线索。

在当时，做什么样的研究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过于轻视经验的倾向。中国人喜欢有气势的东西，比如《河殇》、《人妖之间》等。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对经验的东西不感兴趣，所以科学在中国才不如西方发达。所有文化人都在追求辞章之美、玄虚而飘逸的意境，或者一种宏伟的气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都知道我与林春合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等文章，虽然我们当时工作单位的性质（国务院研究室）和全国各大报纸的转载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当初我们的文章大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那种投合中国文化的“气势”和辞章之美。而在美国受了六年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的我，当时有个强烈感觉，那就是，只有气